

学 习 中 共 党 史
参 考 资 料

(三)

华 南 师 院 政 治 系 编 印
中 共 党 史 教 研 组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二)

目 录

- 大革命失败与广州起义……………叶剑英 (1)
- 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罗荣桓 (8)
- 伟大的会师……………何长工 (16)
- 回顾长征……………刘伯承 (27)
- 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徐向前 (41)
- 长征路上一场严重的路线斗争……………罗瑞卿 (55)

附：（反面材料，供批判用）

1. 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
(1927年11月)…………… (69)
2. 瞿秋白：中国革命低落吗？
(1928年2月20日)…………… (81)
3. 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托陈取消派纲领）
(1929年12月15日)…………… (85)
4. 李立三：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
(1930年5月15日)…………… (104)

5. 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

(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 1930年6月11日

政治局会议通过) (123)

6. 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 (1930年12月) (140)

7. 罗章龙: 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

(1931年1月) (148)

8. 王 明: 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1931年2月) (摘录) (150)

9. 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1932年1月9日) (161)

10. 中共中央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

(1934年1月18日) (172)

11. 林彪: 论短促突击 (1934年6月17日) (194)

12. 瞿秋白: 多余的话 (1935年3月) (205)

13. 张国焘声明 (1938年4月22日) (230)

14. 张国焘敬告国人书 (1938年5月6日) (231)

大革命失败与广州起义

叶 剑 英

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后，又一次震动世界的城市武装起义。虽然，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具体情况下，起义本身遭到了失败，但它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连接起来，是中国革命由共产党单独领导的伟大开端，也是中国无产阶级从城市转入乡村，建立与巩固工农联盟的胜利起点。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对这个变化有着决定影响的，就是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党从诞生时起，就不断地向全国人民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这些主张，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和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出现，马上得到千百万人民的热烈响应，也给从事革命三四十年而没有取得胜利的孙中山以很大的影响，孙中山和一部分进步的国民党员接受了共产党的政纲，改组了国民党，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在共产党帮助下创办了黄埔军校，建立了有共产党参加的革命武装。在这个基础上，孙中山以及改组过的国民党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援，镇压了陈炯明的叛变，消灭了形形色色的军阀，安定了两广局势，使后来的北伐革命有了巩固的基地与后方。

一九二六年七月，轰轰烈烈的北伐革命开始了。在共产党的影响与推动下，北伐军士气昂扬，所向无敌，以破竹之势，直驱长江流域。但是，正当革命蓬勃向前发展，全国人

民欢欣鼓舞时，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却把枪口转向革命。不久，武汉的国民党也公开叛变革命，并与蒋介石合流。国民党叛变革命以后，就以蒋介石为中心建立了白色恐怖的反革命统治。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残酷的杀害，已经取得了巨大胜利的大革命遭到严重的挫折。长江流域形势一落千丈。许多意志薄弱的人，被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吓倒，向反革命投降，倒向南京方面去了。广大的工农群众和革命士兵，以及革命知识青年，遭此严重打击，因而义愤填胸，但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形势的发展给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紧迫的任务：共产党必须挺身而出，高举自己的红旗，甩开一切动摇分子，把一切革命的力量团结起来，单独地领导广大工农群众，粉碎反革命的猖狂进攻，继续奋斗下去。南昌起义就是为了挽救革命所采取的英勇行动。

南昌起义大大鼓舞了从武汉退出的共产党员和一部分进步武装，使他们从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看到了革命的前途和方向，并跟着南昌起义部队的足迹，纷纷南下，向珠江流域撤退，准备以广州作为根据地，重整旗鼓，待机再起。

随张发奎南下的由原武汉军校改编的第四军教导团，南行至九江，曾引起张发奎的猜疑被缴了械。学员们的思想十分混乱，唯恐张发奎也效仿蒋介石来个“清党”，大部分人准备逃亡。经过一番鼓动工作，并指出革命的光明前途，学员们的情绪才安定下来。于是，重新集合起两千多人，继续南下。到达万安，有些人提出就在万安举行暴动，把二十六军的枪械收缴后与南昌起义军会合。当时团党委认为应该先巩固这支武装，待进到敌人的心脏——广州之后，再举行起义。这一方面是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没有联系，行动起来孤立无援；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广州是北伐军的根据地，人民

素有革命传统，在那里举行起义，不但有比较坚实的群众基础，而且给敌人的打击也会远远超过万安。为此，团党委决定教导团继续随张发奎向广州进发。

十月间，第四军赶跑了桂系军阀，进驻广州。

自国民党叛变革命后，广州虽然也为反革命的势力所统治，但是，经过大革命锻炼的、觉悟了的广州工人、农民和一部分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并没有被白色恐怖吓倒。相反的，他们团结得更加紧密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着英勇的斗争。我们回到广州后，更加鼓舞了他们的斗争情绪，革命的气焰更益高涨。被国民党破坏的工会组织又恢复起来了，游行示威的声势越来越大，郊区的农民运动也有新的发展。

广州的革命群众曾对张发奎抱着很大的幻想，他们渴望着由北伐军剩下的最后这支武装能领导他们继续革命。南下时，张发奎也还表示愿意回广东继续革命，可是当他看到广州人民这种高涨的革命气焰时，却又摇动了，最后终于脱下了假左派的外衣，露出其原来的反动面貌，并与汪精卫勾结一起，在广州市内大肆镇压工农运动，捕杀共产党员。这个一度曾是全国革命灯塔的城市，而今也为反革命的阴云所笼罩，黑暗代替了光明，革命的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摧残。面前的事实清楚地告诉了共产党人：只有拿起武器领导工农群众起来暴动，否则革命力量必将受到残酷摧残。十一月二十八日，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指示，做出了在广州发动工农兵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

一年多以前，一个热火朝天的北伐革命，犹如燎原之火，从广州烧到南昌、烧到武汉、烧遍了整个长江流域。而曾几何时，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蒋介石的叛变革命，这股

燎原之火几遭扑灭，只剩下星星火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人民，在此历史紧要关头，继续高举革命大旗，把这星星之火，又从武汉烧到南昌、烧到南方各省、烧到了北伐的策源地——广州。

当时张发奎统治下的广州，正处于不稳定状态，陈铭枢部由汕头向广州进军，黄绍竑部在梧州集结，也有进袭广州的模样。张发奎不得不集中全力来巩固自己地盘，决定先对付桂系，然后再对付陈铭枢，于是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把所有的兵力调离广州，开赴肇庆、梧州一带，与黄绍竑作战。同时又把缴了枪的教导团重新武装起来，以防守广州。广州实际上只有教导团、及新编成的一个警卫团和一部分警察武装，敌人内部非常空虚。

这是举行武装起义的大好时机。广东省委看到这一形势，立即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加紧起义的准备工作，把各个工人组织统一组成工人赤卫队，并秘密地发给武器，把他们武装起来；通过党的关系，把大批党的军事干部和省港罢工工人秘密地派进警卫团，使警卫团基本上掌握在我们党的手里。十二月七日，“行动委员会”秘密举行工农兵代表大会，选出执行委员会，决定十三日起义。

广州工人阶级高涨的革命气焰，引起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注视与警惕，再加上他们得到了我们要在广州起义的消息，便加紧从中破坏。

在帝国主义与南京国民党的授意下，张发奎匆匆调回了前敌总指挥黄琪翔，并准备解散教导团；同时在十日宣布特别戒严令，日夜不停地检查户口。远离广州的反动军队，也开始向广州活动。在此情况下，“行动委员会”不得不把起义时间提前到十一日。

十一日早晨二时许，被反动派称为“赤子赤孙”的教导团学员，在枪毙了张发奎派来的特务参谋长和一些反动军官后，立即投入了市内的战斗。与此同时，潜伏在市内各地的工人赤卫队，犹如万箭齐发，攻向各个指定的目标；警卫团也在团长梁秉枢率领下，解除了一部分反动军官和士兵的武装后宣布起义。仅一个多小时，教导团第一营和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即粉碎了敌人在铁甲车掩护下的负隅顽抗，攻占了最坚固的反动堡垒公安局，并在那里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其他各路起义队伍，也先后占领了无线电局、邮政局、各区警察署，以及其他国民党的党政机关。红旗几乎插遍全市，大街小巷挂满了红布横额，墙上写满了工农革命的标语。仅仅几个小时前被反革命阴云所笼罩的广州，现在又变成了沸腾的、洋溢着胜利的广州了。

必须指出，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使起义军处于不利的地位。英、美、日等帝国主义，除了出动炮舰不断向我市区轰击外，还派海军陆战队在长堤一带登陆。法帝国主义也参加了这一干涉。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市内反革命部队向我展开了猛烈的反扑。广州郊外的敌人，也准备前来增援。起义开始后不久，起义总指挥部讨论了当前局势，当时曾提出：应该迅速停止枪声，建立市内的革命秩序，对一切尚未攻下的残余据点，应包围监视，在政治上瓦解他们，争取他们；应该以教导团为基础，迅速扩建军队，把工人赤卫队和教导团合编成立三个师，将战线推向郊外，发动农民、组织农民队伍，以便迎击前来增援的敌人。大家认为这些措施是正确的，可惜时间已不容许我们这样做，敌人在帝国主义军舰的邦助下进展很快，我们还来不及在市内建立革命秩序，来不及以教导团为中心扩编武装力量，更来不及把战线推到

郊外，敌人已从三面围上来了。从江门赶来的薛岳部，从韶关赶来的许志锐部，以及从石龙赶来的李汉魂部，很快又抢占了市内主要据点。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经三昼夜英勇奋战的起义部队，不得不撤出了广州。

大革命的失败，固然是由于国民党的叛变和帝国主义的干涉，但从工人阶级政党内部来说，经验不足，领导机关所犯的错误，也是革命遭致失败的原因。大革命一开始，还是处于幼年时代的中国共产党，虽然那时候就已懂得了武装斗争的重要，但认识还是不足的，而且缺乏积极、正确的方针。特别是大革命后期，由于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领导，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不去积极掌握军队，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幻想通过和平方式取得无产阶级的胜利。这样，就使党没有充分的力量来防止国民党的叛变，和粉碎他们叛变后对革命的进攻。大革命的失败，深刻地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使他们从惨痛的教训中彻底认识了：中国革命只能由共产党来领导，资产阶级以及其它一切阶层都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彻底的胜利；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可能是和平的，而只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革命必须要有自己的革命的军队，没有革命军队就没有革命的一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各地的武装起义，就是在这个认识基础上发起的。这是坚决的、也是艰苦的大转变。由此起点，便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由共产党单独领导的工农革命，并开始创建了中国人民自己的军队——中国工农红军。

因此，广州起义就绝不是消极的“退兵之一战”，而是在这个转折关头，党为了挽救革命，为了粉碎反革命的猖狂进攻，奋起领导革命人民，向反革命势力进行的一次积极

的、英勇的反击。正如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书中所说的：英雄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并没有完全失败，从广州撤出的一部分起义武装，后来又分别与东江、左右江一带的农民起义武装会合，把革命种籽传播到广大农村，继续进行着革命斗争。

广州起义留下的教训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一条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要派自己的干部下乡。当时革命已经转入低潮，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革命最迫切的任务不可能马上夺取城市，而是如何保存力量，把它转入反革命势力薄弱的农村，组织、发动广大农民进行游击战争，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并依靠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革命胜利。革命离开了巩固的工农联盟，没有农民积极参加，胜利是不可能的。可是这些教训，直到广州起义失败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没有被一些党的领导同志所认识。我们当时的头脑，还充满着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以城市为根据地的思想，对农民的力量没有正确的认识。只有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民族特点，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一关系着中国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并依据这一原理，指导革命在中国取得了胜利。如果广州起义不留恋城市，在起义之后自觉地、主动地迅速向农村发展，与当时正蓬勃发展着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相配合，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游击战争，那么，起义将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原载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

罗 荣 桓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人民，向反革命进行了武装斗争。南昌起义就是党在这危急关头，以武装起义来挽救革命失败的尝试。这个起义向全国人民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接着“八七”党中央紧急会议，坚决地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决定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号召各地农民进行秋收起义。

当时，南方的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农民们普遍要求进行土地革命，有些地区甚至发生了农民自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这种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不仅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派，也使陈独秀机会主义分子们感到害怕。继蒋介石在上海一手制造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长沙的“马日事变”，是反动派向湖南工农群众杀来的第一刀。接着，七月十五日，武汉的国民党也与共产党决裂而叛变革命。党为了挽救革命，粉碎反革命的进攻，决定首先在这些有着雄厚、广大的农民运动基础的省分，发动秋收起义，并且派毛泽东同志到湖南去领导当地的起义。

党一开始就是起义的领导和组织者。它不但向人民指出了继续革命斗争的必要，而且积极地领导人民行动起来。这是秋收起义能够迅速发动的根本原因。同时，未赶上南昌

起义行动的一部分部队，退入了农村，与各地农民武装起义结合起来，成为起义中的军事骨干，并使秋收起义的武装迅速地形成了具有一定战斗能力的军队。应该特别提到秋收起义中主要的一支部队，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湘、鄂、赣三省边境收集起来的部队。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是这支部队的骨干，其余的就是平江、浏阳的农民义勇军，萍乡的工人自卫队，通城、崇阳的农民自卫军，以及醴陵的起义农民。警卫团开始以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名义，驻扎在修水县城。这支部队中，虽然有不少党员，但并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领导，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军事指挥员大部分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没有经过更多实际战争的锻炼，指挥能力较弱，旧的一套带兵方法，妨碍着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由于上述原因，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并不强。

秋收起义开始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在“第三次攻打长沙”的口号下，一团从修水出发，取道长寿街，进攻平江；三团由铜鼓取道东门市，企图在浏阳与北上的二团会合，围攻长沙。起义发动后，收编的第四团丘国轩突然叛变。毫无防范的一团二营，在长寿街受到该部的袭击，全被打垮。三团在东门市受到优势敌人的伏击，伤亡较大。二团占领浏阳城后，也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战斗中损失殆尽。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攻长沙，显然是一种军事上的冒险行动，加之没有广泛地争取群众的配合和战术上的分兵，致使起义的部队遭受严重挫折。

毛泽东同志在从省委去铜鼓的路上，被敌人扣留，后来虽然机智地脱了险，但起义部队战斗已经失利。他在文家市收集了残部，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进军，部队从此踏上了

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正确的道路。南进途中，在泸溪又受到敌人的伏击，部队一共剩下不到一千人，到达江西永新县境的三湾，便立刻进行整顿。

首先是整顿组织，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七个连。整编后，干部多余了。这些干部，大多是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在这一连串的挫折面前，在这危险、艰苦的斗争面前，惊慌失措、灰心动摇起来，少数人已经不告而别了。如果不迅速地处理他们，势必会动摇军心。毛泽东同志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根据自愿，要留则留，要走的就发给五块钱路费，疏散到农村去。整顿后留下来的都是经过战斗和艰苦生活考验的坚定的革命者，人虽少，却精悍得多。

接着，毛泽东同志开始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各级设置了党代表。并且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同志担任书记，于是，这支部队便开始完全处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为了扫除旧军队的一切不良制度和习气，毛泽东同志果断地采取了许多革命的措施。例如，士兵委员会就是这时候产生的。为了反对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实现政治上的官兵平等，建立新式的带兵方法，这就需要进行民主改革。士兵委员会就是实现民主的一个组织形式。那时，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军官要受士兵委员会的监督，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制裁。表面看来，这样做似乎是会鼓励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思想，但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必须坚决反掉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奠定新型的官兵关系——阶级的团结。部队的实际情况是民主不够，而不是什么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问题。因此，只有这样做，才能

更彻底更有效地肃清军阀残余。有了民主，才能提高群众觉悟，才能建立巩固的集中。农民的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思想是容易克服的。记得，起初甚至没收地主的鸡蛋，也要由士兵委员会来平分。后来由于干部处处以身作则，作风民主，士兵受到感动，他们从实践中也知道了无法绝对平均，觉得那样做没有什么好处，便逐渐改变过来，在自觉的基础上爱护干部，听从指挥了。

改善官兵关系的措施，贯彻到各个方面，也表现在物质待遇的变化上。秋收起义以前，军官每顿饭都是四菜一汤，和士兵的待遇悬殊很大。三湾改编以后，因为斗争很艰苦，那时最需要的是官兵艰苦与共，因而待遇改成完全一致，干部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它更加密切了官兵关系，对干部的考验和改造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今天的条件已经不同，因而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生活待遇上，有某些差别，在目前还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南进到达宁冈古城后，毛泽东同志召集了“古城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派人与中央及省委联系，并继续整顿部队内部。这时，由于地方党组织的帮助，还建立了一个后方。

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当然，三湾改编也只是开始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改造，是一个

长期斗争的过程。

当年十月初，毛泽东同志带领部队向遂川方向展开游击活动。那时，天气已经逐渐寒冷，战士们还是穿着破烂的单衣，给养十分困难，并且也没有休整的机会。可是由于党在部队中进行了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战士们情绪始终高涨，在极度疲劳的行军以后，还去四处张贴布告，向老百姓宣传。

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衣和给养，我们进驻到遂川城西的大汾镇。刚住下不久，就遭到挨户团的突然袭击。部队因毫无准备，仓促应战，只好分散撤退。当时四连有两个排，随着毛泽东同志跑到黄均，便停下来收集失散人员，并担负掩护一营集结的任务。这时，三营向湖南桂东方向撤走了。

四连一共剩下三十多个人，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煮饭吃，炊事担子也跑丢了，肚子饿了，只好向老百姓家里找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同志和大家一起，伸手就从饭箩里抓着吃。

等大家吃饱了，毛泽东同志站起来，朝中间空地迈了几步，双足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他的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有力地感染了战士们。他们一个个都抬起头来，鼓起战斗的勇气，充满信心，提着枪就站起队来，向着他那高大的身躯看齐。接着一营就赶上了，队伍向井冈山进发。三营撤退到桂东一带活动，一个月后；在我们从茶陵退出时，也终于会合了。

部队开到井冈山，立即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始进行土地改革，争取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由于革命发展不平衡，在革命的低潮时期，革命力量总退却的时期，我们却

在反革命统治力量较薄弱的赣、湘两省边境的井冈山农村展开了游击战，打倒土豪，分配土地，建立小块根据地。这样，在农村的进攻，也掩护了城市的退却，后来有许多党的干部，被送到游击根据地来，送到武装部队中来。向井冈山进军，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是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从而夺取城市的战略任务的伟大开端。当然，要彻底完成这个战略任务，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艰巨的斗争。因为当时我们控制的还只是些零星的农村阵地，还不巩固，也不联贯，远不能形成对城市的包围。

军队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口号，就是在这时候提出来的。这句口号具体地体现了革命军队是进行政治斗争的武装集团，军事活动与政治工作的密切结合、互相作用的关系；也说明了只有在实际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才能提高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

那时候，部队一方面实行武装割据，进则主动打击敌人，退则周旋荫蔽，避免打无把握的仗，等待时机，准备下一次打击反革命。每到达一地，每打完一仗，都要以班、组为单位，分散到各村去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会。宁冈、永新、遂川、茶陵、泰和一带，都是这样地逐步建立了红色政权，成了革命根据地。这样，不但把革命的红旗牢固地插在湘赣边界，成了蒋介石反革命统治的最大威胁，全国人民的最大希望；同时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教育、锻炼了部队。打茶陵回井冈山后，毛泽东同志亲手订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改为八项注意），将革命军人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用最具体、最简明的语言固定下来。多少年来，它一直指导着每一个指战员的行动。

部队内部继续进行着民主改革。各级党的组织、党代表

制肯定下来了，各级政治部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更普遍建立，并起着积极的作用。官兵真正做到同甘共苦。当时连的主要干部都有马，但谁都不骑，打仗时用来驮伤兵，平时用来驮病号。部队的改造需要经过长期的斗争。这是因为旧军队的一切坏习气、坏作风，还不断通过补充的原俘虏兵反映出来。同时源源而来的参军农民，也带来了自由散漫、保守落后的东西。因此，经常要和这种侵袭作斗争。

经过这种经常的、深刻的内部和外部的斗争，部队真正达到了“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政治情绪高涨，极少有开小差的事例。还记得这样一个故事：毛泽东同志曾带领三十一团的三营，下山去接应二十八团由湘南返回井冈山。夜间通过桂东地区，遭到敌人袭击，部队当时被打散了，大家很着急。但第二天清晨一集合，只少了一个担架兵。谁知当部队回到井冈山上时，这个担架兵早已回来了。

秋收起义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它开辟了中國革命前进的道路，这就是向农村进军，依靠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借此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逐渐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最先从行动中正确地解决了依靠农村、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革命战略问题。毛泽东同志主张：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在武装的支持下，进行土地革命，这就使广大农民群众更容易发动；没有武装，便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但是，假如武装不和土地革命结合，不是以土地革命为武装斗争的内容，那么有了武装也会陷于失败。同时，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如果不和建设根据地结合起来，土地革命的成果便不能巩固，武装不能在群众中生根立足，容易受到敌人的打击而失败。革